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 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林李月^{1,2}, 朱 宇^{1,2,3}, 柯文前^{1,2}, 王建顺^{1,2}

(1.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 福州 350007; 2. 湿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福建师范大学), 福州 350007; 3. 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中心, 上海 200444)

摘要: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 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 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 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 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 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 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 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 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 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 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 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 在小城市, 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城市居留意愿; 城市规模; 流动人口

DOI: 10.11821/dlxb201904009

1 引言

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是当前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有序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为主的流动人口落户城市、实现市民化, 已成为大部分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的主要方式。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流动人口生存状况的不断改善, 单纯的城市户口已不足以吸引流动人口长期定居、实现市民化, 附着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才是流动人口更为关心的福祉^[1]。然而, 受户籍制度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影响, 流动人口及其随迁家属往往无法获取与当地城镇居民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2-3]。这种状况使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抑制了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 阻碍了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 进而影响了整个国家城镇化的健康发展^[4-8]。因此, 解决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

收稿日期: 2017-12-17; 修订日期: 2018-04-1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01163, 41471132, 41601165); 福建省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2016R1032-6)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501163, No.41471132, No.41601165; Public-Funded Key Project of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jian, No.2016R1032-6]

作者简介: 林李月(1985-), 女, 福建霞浦人, 博士, 副研究员,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10108M), 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与城乡发展。E-mail: lly30@163.com

通讯作者: 朱宇(1961-), 男, 福建闽清人, 博士,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1605M), 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流动、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等。E-mail: zhu300@fjnu.edu.cn

问题,促进流动人口定居、落户城市,已成为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鉴于此,中央层面积极出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政策法规^①,提高流动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以期藉此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

然而,政策预期与现实结果往往存在落差。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拓展至流动人口的政策能否有效提高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制度效应问题。目前,国内考察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同时,不同规模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存在差异,国内较少从城市规模差异视角,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的政策导向看,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获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面临的政策限制越大。不同规模城市公共服务的购买能力和支付水平不一样,一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政府的购买水平高^[9],而此类城市恰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地^[10],随着流动人口规模增加,可能会导致此类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拥塞,造成大量流动人口被排斥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在此背景下,若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下降,则流动人口的主观需求与当前城市规模越大,其获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面临的政策限制越大的现实是相适应的;若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随城市规模的扩大不降反升,那便需对这种意愿与当前政策间的冲突予以充分重视,并藉此完善相关政策。因此,从城市规模差异的视角考察面向流动人口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制度效应问题。

迄今为止,许多研究深入探讨了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在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强度的测量上,涉及到的研究指标主要包括:“是否愿意定居城市”“是否愿意定居目前打工城市”“是否愿意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是否愿意放弃家乡土地”等。因选取不同指标、调查数据来源各异,目前学界对怎样科学衡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强度方面尚未达成共识。过往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测度研究或仅关注长期居住意愿和定居意愿,或仅关注户籍迁入意愿,均仅涵盖了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某个侧面,尚不全面。如:长期居住意愿和定居意愿更多与流动人口的生计需要和经济利益有关,而户籍迁入意愿则与流动人口对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相关。

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影响因素众多,影响机制相当复杂。在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过往研究关注流动人口自身的性别、年龄、收入水平、职业类型、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流动范围、流动经历等因素,并认为这些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主要因素,但在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效应上并未达成共识^[1, 4, 11-15]。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已不再局限于获取经济利益,也迫切希望获得流入地城市社会的接纳,并逐步融入流入地城市社会之中^[8],社会融合已成为影响其是否在城市居留的重要因素,表现为流动人口若对流入城市的认同感越高,则其定居城市的愿望就越强烈^[8, 16-19]。

目前,国内尚缺乏考察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其城市居留意愿影响作用的研究工作。尽管部分研究已经意识到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对促进流动人口落户城市的积极作

① 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规定了农业转移人口应享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

用,但主要是以流入城市为研究单元,从整体上揭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整体和共同影响作用^[20-21]。近期少数文献开始尝试以流动人口个体为研究对象,但用于测量公共服务的指标有限,仅考察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居民健康档案或住房公积金等单一公共服务项目对其长期居住或户口迁移意愿的影响效应^[22-24]。同时,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在就业机会、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也是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好的生活服务,流动人口普遍倾向于向大城市集中,因此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与城镇人口规模显著正相关^[25]。流动人口的大城市偏好还表现在长期居住意愿和户籍迁入意愿上,呈现出大城市居留意愿强,中小城市流动性强的特征^[11, 26]。在这种特征下,不同规模城市间流动人口的家庭成员同住趋势、生育意愿、城市融入和获取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能性等亦存在差异^[27-29]。如: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获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大,而获得居民健康档案的可能性越小。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水平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是否会导致其城市居留意愿的不同?对此问题目前研究尚少。因此,亟待开展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特征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研究。

对城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言,新型城镇化应从单纯提升人口城镇化率,转移到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来提升城镇化质量。因此,该地区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仅反映着微观个体在其流入城市的去留,而且在宏观上将持续地影响着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人口流动过程和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尽管近些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逐渐放宽了流动人口的户籍管理政策,但东部沿海作为中国流动人口最为集聚的地区之一,流动人口在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上仍面临着诸多限制;再者,东部沿海地区城市规模复杂多样,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在人口数量、产业形态、经济前景、工资水平和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都存在差异^[30-33]。在此背景下,研究该地区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与其城市居留意愿间的关系,更有助于透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影响效应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将以流动人口最为集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福建省和广东省)作为研究区域,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以及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的指标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系统分析获得不同类别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以及不同规模城市间影响作用的差异特征,为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市民化政策和中国城镇化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特征性事实

数据来源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②。该数据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于2016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对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籍、调查时点年龄为15岁以上的流入人口的调查而得到的。基于研究需要,本文采用了该数据集中的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福建省和广东省6省市的样本数据,共涉及69个城市,48000份样本。为了反映城市规模差异,本

② 作者在此感谢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授权提供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文依据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③,将69个城市样本划分为6种类别。其中,超大城市有广州、上海、深圳3个;特大城市有东莞、佛山、杭州、南京、汕头、苏州6个;Ⅰ型大城市包括福州、济南等10个城市;Ⅱ型大城市包括济宁、嘉兴等24个城市;中等城市包括滨州、德州等18个城市;Ⅰ型小城市有8个,分别是河源、丽水、南平、宁德、平潭综合实验区、三明、汕尾、漳州。

2.2 变量设置

2.2.1 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测度方法 测量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是一件科学细致的基础工作。结合研究目标和调查问卷数据的固有特点,将调查问卷中的“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3个指标结果叠加起来,衡量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3个指标对应的问题分别是:“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和“您家打算在哪些地方购买住房”。这3个指标是关联递进的,流动人口往往先有长期居住的打算,进而愿意迁入户口,最后逐渐形成在本地购房的诉求,真正实现行为上的永久居住,因此,这3项指标是同向指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将前两者选择“打算”和“愿意”取值为1,否则为0,后者将打算在本地购房设置为1,其余为0;将这3个指标等权加总,用来测量城市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程度的强弱,城市居留意愿被表达成取值范围为(0, 1, 2, 3)的序次变量,其中,0表示“无居留意愿”,1表示“低居留意愿”,2表示“中居留意愿”,3表示“高居留意愿”。

2.2.2 核心自变量 流动人口获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涉及面宽,涵盖内容和构成组分较多,在选取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指标方面,本文借鉴了已有研究对城市公共服务的分类^[34-35]和考虑与现行政策的可衔接性,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规定的农业转移人口应逐步享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④为基础,并结合调查问卷数据,选取了8个核心指标测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劳动合同、居民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劳动合同是与就业关联的公共服务,与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紧密相关,是由市场化推动的工业公民权利,其供给方为企业或雇主,政府在其中扮演着监督的角色^[36]。居民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是非就业关联的公共服务,与流动人口是否就业无关,是由国家政策推动的普通公民权利,其供给方为政府,居民健康档案是决定着流动人口是否能接受系列健康管理服务的一项关键指标,健康教育则决定了流动人口健康素养水平的高低和选择各类健康管理服务的主动性^[37-38]。

2.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代表其他影响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根据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结果,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经历等均对其城市居留意愿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流动人口的个体和家庭特征、流动经历等设定为控制变量。个体和家庭特征主要为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受教育年限、婚姻状态、职业类型和

③ 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即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1000万人);Ⅰ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为50万~100万人);Ⅰ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为20万~50万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20万人)。

④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规定应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即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和拓宽住房保障渠道。具体内容请详见http://www.ndrc.gov.cn/fzgggz/fzgh/ghwb/gjjh/201404/t20140411_606659.html。

家庭月节余等；流动经历包括本地滞留时间、流动方式和流动范围。表1为变量的定义和统计描述。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Tab.1 Variables and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城市居留意愿强度(Y)	无=0；低=1；中=2；高=3	1.324	1.011
核心自变量			
是否参与养老保险(X ₁)	否=0；是=1	0.337	0.473
是否参与失业保险(X ₂)	否=0；是=1	0.297	0.457
是否参与工伤保险(X ₃)	否=0；是=1	0.342	0.474
是否参与医疗保险(X ₄)	否=0；是=1	0.235	0.424
是否有住房公积金(X ₅)	否=0；是=1	0.143	0.350
劳动合同签订(X ₆)	没有=0；有=1	0.413	0.492
是否建立健康档案(X ₇)	否=0；是=1	0.311	0.463
健康教育普及程度(X ₈)	低=1；中=2；高=3	1.876	0.648
控制变量			
性别(X ₉)	女=0；男=1	0.517	0.500
年龄(X ₁₀)	连续变量	35.113	9.948
年龄平方(X ₁₁)	连续变量	7.038	0.566
受教育年限(X ₁₂)	连续变量	10.135	3.038
户口性质(X ₁₃)	农业=0；非农业=1	0.133	0.340
婚姻状况(X ₁₄)	单身=0；在婚=1	0.846	0.361
本地滞留时间(X ₁₅)	连续性变量	6.000	5.643
职业类型(X ₁₆)	白领人员=1；商业服务业人员=2；生产运输操作人员=3；其他人员=4；无就业=5	2.688	1.125
家庭节余类型(X ₁₇)	家庭节余无=1；家庭节余少=2；家庭节余中=3；家庭节余多=4	2.272	0.785
流动范围(X ₁₈)	跨省流动=0；省内流动=1	0.316	0.465
流动方式(X ₁₉)	独自流动=1；部分家庭成员流动=2；举家迁移=3	1.891	0.829
城市规模(X ₂₀)	超大城市=1；特大城市=2；Ⅰ型大城市=3；Ⅱ型大城市=4；中等城市=5；Ⅰ型小城市=6	2.678	1.361

注：① 健康教育包括职业病防治、性病/艾滋病防治、生殖与避孕/优生优育、结核病防治、控制吸烟、精神障碍防治、慢性病防治、营养健康和防雾霾9种，根据流动人口接受健康教育种类的多寡将其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分为“高(接受了不少于6种)”“中(接受了3~6种)”和“低(接受了不超过3种)”3个级别。② 借鉴已有研究^[4]的分类和结合调查问卷数据，将职业类型分为白领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其他人员和无就业者。其中，白领人员指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包括经商、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装修、快递、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包括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其他人员包括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无固定职业、其他；无就业者为目前尚未就业的流动人口。

2.3 研究方法

2.3.1 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 本文的因变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是一个四分类有序变量，故选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进行影响作用分析。序次 Logistic 模型^[39]的累计概率函数的公式如下：

$$p_j = p(y \leq j | X) = \frac{\exp\left(a_j + \sum_{i=1}^n \beta_i x_i\right)}{1 + \exp\left(a_j + \sum_{i=1}^n \beta_i x_i\right)} \quad (1)$$

式中： y 代表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 a_j 是常数项回归系数； β_i 是系数； x_i 表示模型中引入的核心自变量和控制变量，($i=1, 2, \dots, n$; $n=20$)，其中，核心自变量8个，控制变量12个； $j=0, 1, 2, 3$ 分别代表“无居留意愿”“低居留意愿”“中居留意愿”“高居留意愿”。

$$\log\left(\frac{p_j}{1-p_j}\right) = a_j + \sum_{i=1}^n \beta_i x_i \quad (2)$$

式(2)即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的数学表达形式 $p/1-p$ 为发生比，即事件($y \leq j$)发生概率与事件($y > j$)不发生概率之比，用发生比的对数形式表示核心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线性组合。发生比率说明核心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发生概率变动的影响。

2.3.2 模型估计、拟合与检验 本文用Stata软件进行模型估计，采用log pseudo likelihood和Pseudo R^2 检验和评价模型的整体显著性和拟合优度。由于序次Logistic回归分析的假设之一是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先对自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确保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接着采用全部纳入法(Enter)将核心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一起纳入，进行综合回归分析。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robustness)”，本文还做了稳健性回归。

在构建总模型时，还将城市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为了检验获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城市规模间是否存在交互项关系，在总模型中还估计了各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规模交互项的作用。然后，将样本城市分组，分别针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I型小城市建立分模型，对比分析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其城市居留意愿影响作用的差异特征。

3 结果与分析

3.1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水平和城市居留意愿

从6省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看，被调查流动人口样本中，打算在当前流入城市长期居住者占59.02%，愿意把户口迁入当前流入城市者占45.33%，希望当前流入城市购房者占18.21%。这表明，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存在强度差异，运用部分指标只能研判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某一侧面。从加和计算后的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分布情况看，城市居留意愿强度为“无”和“低”的占比分别为26.26%和28.93%，二者合计已超过一半；而“中”和“高”的比例仅为30.96%和13.85%。

表2表明，提高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普及率，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强度。当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升健康教育普及程度时，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强度为“中”和“高”的比例也随之上升，尤其是参与各类社会保险项目的流动人口其居留意愿强度为“高”的比例至少比没有参与相应类别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高出10个百分点。此外，签订劳动合同和建立健康档案的流动人口，其居留意愿强度为“高”的比例也分别高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和没有建立健康档案的流动人口。

3.2 城市规模、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水平和城市居留意愿

表3列出了东南沿海6省市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水平。各

表2 流动人口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与居留意愿强度(%)
Tab. 2 Migrants' urban public services and their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居留意愿强度			
			无	低	中	高
就业关联公共服务	是否参与养老保险	否	31.68	32.01	26.45	9.86
		是	16.20	23.22	39.31	21.27
	是否参与失业保险	否	30.76	31.77	27.43	10.04
		是	16.19	22.58	38.84	22.39
	是否参与工伤保险	否	29.81	31.75	27.94	10.50
		是	19.60	23.65	36.60	20.15
	是否参与医疗保险	否	29.95	30.94	28.16	10.95
		是	14.88	22.74	39.58	22.80
	是否有住房公积金	否	28.71	30.70	29.21	11.38
		是	12.53	18.99	40.76	27.72
非就业关联公共服务	健康教育普及程度	否	26.80	31.16	29.84	12.20
		是	25.47	25.70	32.58	16.25
		否	25.47	25.70	32.58	16.25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低	30.47	29.41	29.05	11.07
		中	26.17	29.16	30.33	14.34
		高	19.35	27.27	36.44	16.94
	是否建立健康档案	否	29.11	28.92	29.29	12.68
		是	20.21	28.94	34.49	16.36

表3 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水平(%)
Tab. 3 Urban public services of migrants in different-sized cities (%)

公共服务		城市规模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I 型大城市	II 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I 型小城市
养老保险参与率		49.31	38.85	30.26	17.4	21.87	20.68
失业保险参与率		41.86	37.15	26.37	15.37	18.74	16.06
工伤保险参与率		46.74	38.97	30.01	23.13	22.03	22.39
医疗保险参与率		30.39	26.98	24.26	13.65	16.24	11.45
住房公积金拥有率		24.85	17.15	9.04	7.3	6.56	8.24
劳动合同签订率		49.09	44.78	36.89	37.14	33.2	27.89
健康档案建档率		30.56	20.35	39.59	30.92	40.37	16.42
健康教育普及程度	低	30.58	33.41	22.76	24.56	29.01	31.64
	中	52.74	54.8	57.9	61.77	55.43	56.61
	高	16.68	11.79	19.34	13.67	15.56	11.75

类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参与率和劳动合同签订率基本上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提高。说明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政府落实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规范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工作力度更大，因而流动人口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社会保险和住房等保障。从非就业关联公共服务的获得情况看，超大城市、I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档率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较高，而特大城市和小城市则较低。特大城市较少提供非就业关联的公共服务是户籍排斥作用产生的结果；而小城市较少提供非就业关联的公共服务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有限，基本卫生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不够成熟等有关。

图1显示,随着城市规模变大,“高”和“中”居留意愿比例随之上升,其中超大城市“高”和“中”比例合计占62.08%,远高于中小城市;而“无”和“低”居留意愿比例的变化特征则恰恰相反。这表明,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强度具有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增强的梯度变动特征,即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强,而中小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弱。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就业机会、薪酬待遇总体有限^[40],虽然在政策上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较好,但实际供给水平和质量却较差,因而抑制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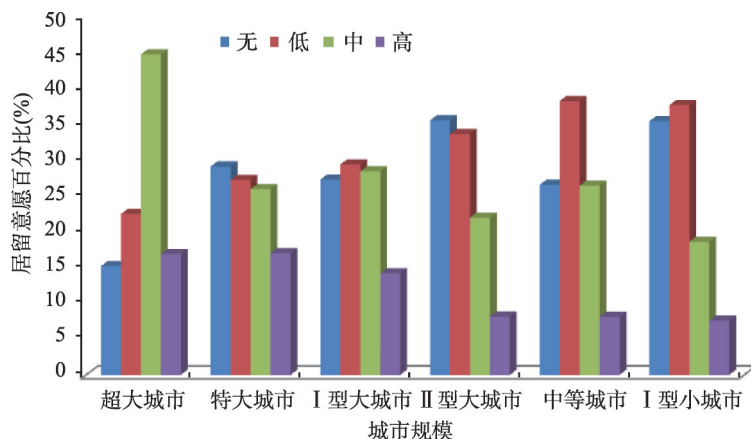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分布

Fig. 1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of migrants in different-sized cities

3.3 流动人口获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采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结果如表4的模型1所示。为了检验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城市规模间是否存在交互关系,在模型1原有变量的基础上中加入8个各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规模交互项,运行得到模型2。如表4所示,两个模型的 log pseudo likelihood 和 Pseudo R^2 大体相当,都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此外,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故在此不再累述,下文主要分析核心自变量的影响效应。

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经历和城市规模变量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其城市居留意愿表现出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且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模型1的结果发现,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劳动合同、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等反映流动人口个体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状况的变量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与没有享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的流动人口相比,有上述社会保障的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更高,表明有享受到社会保障服务对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具有推动作用。健康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的意愿越强。加大对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培训,提升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对于推进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反映劳动力市场规范程度和劳动保护的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变量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呈负面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流动人口相比,签订了劳动合同、参与工伤保险的流动人口,其城市居留意愿反而更低。从理论上说,流动人口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或雇主为其购买了工伤保险,便能得到更为

表4 流动人口城镇公共服务获得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Tab. 4 Urban public services of migrants and effects on their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核心自变量				
养老保险(否)	0.246***	0.042	0.223**	0.088
失业保险(否)	0.239***	0.049	0.247**	0.091
工伤保险(否)	-0.229***	0.043	-0.277**	0.089
医疗保险(否)	0.206***	0.032	0.278***	0.062
住房公积金(否)	0.251***	0.034	0.131**	0.066
劳动合同(否)	-0.096***	0.026	-0.122**	0.053
健康档案(否)	0.136***	0.020	-0.021	0.046
健康教育普及程度	0.137***	0.014	0.162***	0.030
控制变量				
男(女)	-0.013	0.019	-0.014	0.019
年龄	-0.054***	0.006	-0.055***	0.006
年龄平方	0.931***	0.107	0.939***	0.107
受教育年限	0.112***	0.004	0.112***	0.004
非农业(农业)	0.353***	0.030	0.357***	0.030
在婚(单身)	0.346***	0.034	0.345***	0.034
本地滞留时间	0.057***	0.002	0.056***	0.002
职业类型(白领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0.123***	0.035	0.123***	0.035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316***	0.036	-0.318***	0.036
其他人员	0.026	0.060	0.027	0.060
无就业	0.172***	0.044	0.167***	0.044
家庭节余类型(家庭节余无)				
家庭节余少	0.041	0.028	0.041	0.028
家庭节余中	0.261***	0.032	0.262***	0.032
家庭节余多	0.541***	0.040	0.548***	0.041
省内流动(跨省流动)	0.546***	0.022	0.543***	0.022
流动方式(独自流动)				
部分家庭成员流动	-0.019	0.024	-0.019	0.024
举家迁移	0.322***	0.024	0.322***	0.024
城市规模(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0.537***	0.029	-0.557***	0.036
I型大城市	-0.515***	0.027	-0.540***	0.048
II型大城市	-0.835***	0.030	-0.868***	0.067
中等城市	-0.822***	0.041	-0.872***	0.088
I型小城市	-1.070***	0.065	-1.100***	0.117
交互项				
城市规模×养老保险			0.012	0.031
城市规模×失业保险			0.000	0.036
城市规模×工伤保险			0.019	0.031
城市规模×医疗保险			-0.037	0.025
城市规模×住房公积金			0.056*	0.026
城市规模×劳动合同签订			0.009	0.018
城市规模×建立健康档案			0.057***	0.015
城市规模×健康教育普及程度			-0.011	0.010
log pseudo likelihood	-52060.839		-52047.309	
pseudo R ²	0.097		0.097	

注:***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括号内的类别即为该变量的参照组; 常数项的系数未列出。

健全的劳动保护,工作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大大提高,从而提升其在城市居留的意愿。然而,现实与理论不相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参与工伤保险和签订劳动合同的流动人口,主要为就业于制造业、从事一线生产的普通劳动者,就业单位性质以私营企业为主^⑤;这部分流动人口因其就业稳定性差,没有可预期的高收入,其在现流入城市的生存能力或定居能力往往不如商业服务业或自主就业的流动人口,因此整体城市居留意愿不高。这一推断与模型1和2中职业类型变量的影响作用互相呼应。

交互作用可以理解为一个自变量因另一个自变量的变化而对因变量产生不同强度的影响^[41]。模型2结果显示,在加入交互项后,健康档案的影响不显著了,起显著作用的是健康档案与城市规模的交互项,其他变量的影响力基本维持不变。健康档案与城市规模的交互项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与等级规模高的城市的流动人口相比,健康档案对规模等级低的城市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理论上,建立健康档案的流动人口通常更容易在城市享受其他方面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同时在等级规模较低的城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流动人口的准入门槛也较低;两者结合,使建立健康档案的流动人口在等级规模小的城市的回报率更高,从而使其居留意愿也更强烈。其他变量与城市规模的交互项不显著,表明其他公共服务未因城市规模的变化而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不同强度的影响。

3.4 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表5为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获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6个模型的log pseudo likelihood和Pseudo R^2 显示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统计结果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其城市居留意愿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效应,且影响方向与总模型基本保持一致,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不同规模城市间存在差异。

首先,从与就业关联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基本上只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中仍然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工伤保险和签订的劳动合同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负向抑制作用也只在部分大城市中显著有效。这一结果说明,流动人口在城市获得的与就业关联的基本公共服务,基本上只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影响效应;尤其是正向的影响效应,除了养老保险外,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仅限于大城市。产生这一结果是因为: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就业市场化和劳动保护程度有限,企业/雇主往往向流动人口提供较少的社会保险和住房保障;而且中小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为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其他的占比高于大城市^⑥,政策的限制和法律意识的薄弱使得这类流动人口无法或不愿意购买社会保险和缴纳住房公积金,因此这类公共服务无法发挥其规模效应,不足以在中小城市产生影响作用。

从非就业关联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获得的非就业关联公共服务均对其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除超大超市和Ⅱ型大城市外,在其他规模城市,与没有建立健康档案的流动人口相比,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的流动人口均表现出更高的城市居留意愿。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特大城市中显示显著影响外,在其余规模城市都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即流动人口健康教育普及程度

⑤ 东部沿海6省市的调查显示,参与工伤保险和签订劳动合同的流动人口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例分别为49.1%、52.8%;就业单位为私营企业的比例分别为48.3%和55.3%。

⑥ 东部沿海6省市的调查显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为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其他的占比分别为28.8%、28.5%、31.2%、32.3%、37.8%和34.9%。

表5 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Tab. 5 Urban public services of migrants in different-sized cities and effects on their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I 型大城市			II 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I 型小城市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核心自变量																		
养老保险(否)	0.426***	0.080		-0.001	0.110		0.168*	0.075		0.365**	0.136		0.627***	0.173		0.594	0.272	
失业保险(否)	0.214**	0.078		0.352*	0.144		0.372***	0.107		0.153	0.162		-0.196	0.251		-0.443	0.347	
工伤保险(否)	-0.175*	0.081		-0.421***	0.123		-0.147	0.087		-0.355***	0.098		0.283	0.214		0.010	0.287	
医疗保险(否)	0.105	0.054		0.338***	0.069		0.171**	0.066		0.363**	0.120		-0.525***	0.164		-0.387	0.293	
住房公积金(否)	0.097	0.061		0.431***	0.073		0.163**	0.064		0.443***	0.112		0.324	0.173		0.717	0.301	
劳动合同(否)	-0.203***	0.055		-0.080	0.058		-0.072	0.047		-0.154*	0.062		0.060	0.103		-0.127	0.198	
健康档案(否)	0.034	0.045		0.143**	0.050		0.246***	0.035		0.031	0.051		0.221**	0.076		0.462**	0.171	
健康教育普及程度	0.205***	0.028		0.049	0.032		0.164***	0.027		0.108**	0.038		0.117*	0.056		0.234**	0.105	
控制变量																		
男(女)	-0.093*	0.040		-0.044	0.042		0.022	0.035		0.051	0.046		0.125	0.076		-0.177	0.132	
年龄	-0.027*	0.012		-0.087***	0.014		-0.044**	0.013		-0.072***	0.014		-0.082***	0.025		-0.009	0.035	
年龄平方	0.473*	0.216		1.430***	0.241		0.706**	0.224		1.279***	0.247		1.367**	0.459		0.129	0.659	
受教育年限	0.114***	0.008		0.100***	0.009		0.120***	0.008		0.106***	0.010		0.096***	0.017		0.035	0.028	
非农业(农业)	0.421***	0.054		0.400***	0.070		0.492***	0.066		0.172*	0.087		0.318*	0.129		0.140	0.209	
在婚(单身)	0.219**	0.069		0.463***	0.070		0.322***	0.068		0.205*	0.080		0.589***	0.152		0.236	0.215	
本地滞留时间	0.067***	0.003		0.057***	0.004		0.049***	0.004		0.054***	0.005		0.042***	0.007		0.059***	0.010	
职业类型(白领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0.061	0.063		0.005	0.087		0.158*	0.072		0.189	0.098		0.101	0.143		0.054	0.241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405***	0.068		-0.483***	0.087		-0.328***	0.073		-0.116	0.098		-0.272	0.144		-0.006	0.256	
其他人员	-0.051	0.102		-0.165	0.125		0.016	0.129		0.086	0.177		0.709**	0.261		0.564	0.374	
无就业	0.151	0.084		-0.075	0.105		0.146	0.087		0.251*	0.117		0.396*	0.177		0.222	0.285	
家庭节余类型(家庭节余无)																		
家庭节余少	-0.031	0.065		0.094	0.064		0.082	0.050		0.055	0.064		-0.142	0.098		0.022	0.154	
家庭节余中	0.332***	0.071		0.362***	0.071		0.284***	0.058		0.128	0.077		-0.081	0.122		-0.076	0.203	
家庭节余多	0.686***	0.080		0.766***	0.093		0.629***	0.083		0.136	0.108		0.009	0.167		-0.182	0.289	
省内流动(跨省流动)	-0.030	0.064		0.367***	0.047		0.705***	0.037		0.711***	0.052		0.437***	0.079		0.739***	0.139	
流动方式(独自流动)																		
部分家庭成员流动	0.023	0.047		-0.064	0.054		-0.052	0.046		-0.023	0.060		0.008	0.101		-0.040	0.162	
举家迁移	0.062	0.055		0.317***	0.055		0.294***	0.044		0.493***	0.059		0.283**	0.092		0.569***	0.158	
log pseudo likelihood	-11671.437			-10420.900			-16104.024			-8726.799			-3291.336			-1160.355		
pseudo R ²	0.092			0.077			0.093			0.086			0.062			0.068		

注: ***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括号内的类别即为该变量的参照组; 常数项的系数未列出。

越高,其城市居留意愿越强。这是因为超大超市、特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成本高、生存压力大,加上户籍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准入门槛高,面临着“双重排斥”,更为关注能带来实际经济效益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及其带来的影响效应,因此导致健康档案或健康教育这类公共服务无法发挥显著影响效应。

在小城市中,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城市愿意产生显著影响效应,而其他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与否均未对其城市居留意愿造成显著影响。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在小城市获得的各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偏低,抑制了公共服务规模效应的发生,从而无法对其居留意愿产生影响。这一方面说明了小城市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低效供给引发了流动人口的不满,但这也反过来提高了小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价值,一旦基本公共服务在不同规模城市间供给均等化,流动人口在小城市也能获得多量、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那么便有可能促使流动人口在小城市稳定下来,进而减缓人口向大城市流动集聚的趋势。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将“长期居留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3个选项的结果叠加起来,衡量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并把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利用2016年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东部沿海6省市(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福建省和广东省)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及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整体而言,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比较有限,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趋势。可以预见,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人口持续向大城市流动仍将是人口发展的重要现象。人口持续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与当前重点推进中小城镇发展,限制大城市,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政策导向存在冲突。

(2) 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愿意的关键因素,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居留与否的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项目和流入城市规模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① 总体来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促进其形成在城市永久居留的意愿,尤其是提高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健康档案的覆盖面和健康教育的普及程度能够更有效地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② 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对其城市居留意愿产生影响效应,大城市通过拥有较规范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和较为完备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系统而形成了自身优势,能有效地促进流动人口永久居住,而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市)只能通过非就业关联基本服务的供给来留住流动人口,而原本为流动人口提供较少的就业关联公共服务则不足以对流动人口构成吸引力。这一结果很有可能引发流动人口为了追求大城市的优质公共服务而继续向大城市集聚,导致中小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持续疲软,形成城市居留意愿“洼地”,城市分层更加明显。

4.2 政策建议

为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并且提高城镇化质量,本文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

(1) 鉴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其城市居留意愿提升的积极效应, 各类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和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取向应该是增强流动人口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尤其是重视短期无法落户、持有居住证流动人口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是探索流动人口的“就业—居住—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耦合机制, 积极推进流动人口在就业地参与、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并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全国范围内的可携带和均等化。

(2) 正视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其城市居留意愿影响效应在不同规模城市间存在差异的事实, 引导不同规模城市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的协调均衡发展, 促进流动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大城市需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突破思维定式, 逐步有序地降低落户门槛或改变落户条件, 实现普通劳动者而非仅是高技能人才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小城市政府要增加财政支出, 提高政府层面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尤其应该着力推进就业市场化与劳动权利均等化进程, 保障就业关联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同时, 中央政府应增强提供地方公共品的职责, 通过财政转移推进城市间基本公共服务适度均等化, 引导流动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间进行合理配置。

(3) 重视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与当前政策导向间的矛盾, 妥善解决大城市普通劳动者的问题。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过程中, 应摒弃实施不符合发展规律的限制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政策, 强行推行人口疏解将流动人口群体中的普通劳动者驱逐出城的做法。同时, 大城市应注重都市圈和城市内部的科学规划, 有针对性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and 促进资源配置均衡发展, 逐步有序地扩大流动人口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范围, 为其提供发展空间, 进而根据所提供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促进流动人口在不同区域和城市间的自由流动。

文中所用问卷没有涉及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故无法分析随迁子女所受公共服务特征(诸如医疗、入学等)对其父母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 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存在一定偏差。事实上, 举家迁移的流动人口可能对子女教育和升学有着更为强烈的需求^[1, 32], 期待后续工作能进一步拓展和完善该项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Zhang Yi. Migrant workers' willing of hukou register and policy choice of China urbaniz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1, 31(2): 14-26. [张翼. 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 *中国人口科学*, 2011, 31(2): 14-26.]
- [2] Xu Q, Guan X, Yao F. Welfare program participation among rural to 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1, 20(1): 10-21.
- [3] Chen Yunsong, Zhang Yi. The inequality effec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urbaniz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5 (6): 78-95, 206-207. [陈云松, 张翼. 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与社会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 2015(6): 78-95, 206-207.]
- [4] Zhu Y, Chen W Z.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Recent changes and multifaceted individual-level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0, 16(4): 253-267.
- [5] Ren Yuan, Qiao Nan. Social integration for migrants: Process, measure and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Research*, 2010, 34 (2): 11-20. [任远, 乔楠.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人口研究*, 2010, 34(2): 11-20.]
- [6] Yang Juhua. Research on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5(2): 61-79. [杨菊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15(2): 61-79.]
- [7] Wang Mingfeng, Cheng Hong, Ning Yuemin.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Shanghai's urban villag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8): 1243-1255. [汪明峰, 程红, 宁越敏. 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2015, 70(8): 1243-1255.]

- [8] Lin Liyue, Zhu Yu. Spatial vari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of migrant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of China's prefecture- and provincial-level cities: Evidence from the 2012 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0): 1696-1709. [林李月, 朱宇.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地理学报*, 2016, 71(10): 1696-1709.]
- [9] Yang Gangqiang, Li Mengqin, Meng Xia. The scale of migrants, fiscal autonomy and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Goods: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test of 286 cities' panel data. *China Soft Science*, 2017(6): 49-58. [杨刚强, 李梦琴, 孟霞. 人口流动规模、财政分权与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研究: 基于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检验. *中国软科学*, 2017(6): 49-58.]
- [10] Sun Yang, Yao Shimou, Lu Dadao, et al. Population mobil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n the three coastal agglomeration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12): 1777-1783. [孙阳, 姚士谋, 陆大道, 等. 中国城市群人口流动问题探析: 以沿海三大城市群为例. *地理科学*, 2016, 36(12): 1777-1783.]
- [11] Hu Chenchong, Zhu Yu, Lin Liyue, et al. Analysis on floating population'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 Insights from a survey in Fujian Province.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2011, 17(3): 2-10. [胡陈冲, 朱宇, 林李月, 等. 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一项在福建省的问卷调查. *人口与发展*, 2011, 17(3): 2-10.]
- [12] Liu Yuqi, Liu Ye, Li Zhigang.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new migrants in China's large citie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7): 780-787. [刘于琪, 刘晔, 李志刚.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地理科学*, 2014, 34(7): 780-787.]
- [13] Qin Lijian, Wang Zhen. Analysis on the determinatio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4, 34(5): 99-106. [秦立建, 王震. 农民工城镇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 2014, 34(5): 99-106.]
- [14] Dong Xin.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permanent migration desire of rural-urban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5, 35(6): 91-99, 128. [董昕. 住房支付能力与农业转移人口的持久性迁移意愿. *中国人口科学*, 2015, 35(6): 91-99, 128.]
- [15] Yang Xue, Wei Hongying. New feature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migrant long-term residence tendency. *Population Research*, 2017, 41(5): 63-73. [杨雪, 魏洪英.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新特征及影响机制. *人口研究*, 2017, 41(5): 63-73.]
- [16] Ye Pengfei.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of migrant workers: An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survey data from seven provinces/district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1, 31(2): 153-169. [叶鹏飞. 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 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 2011, 31(2): 153-169.]
- [17] Wang Yujun.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Findings from a twelve-city migrant survey. *Population Research*, 2013, 37(4): 19-32. [王玉君.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 基于十二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人口研究*, 2013, 37(4): 19-32.]
- [18] Zhang Peng, Hao Yubiao, Chen Weimin. Happines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igration decision. *Economic Review*, 2014 (1): 58-69. [张鹏, 郝宇彪, 陈卫民. 幸福感社会融合对户籍迁入城市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1年四省市外来人口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济评论*, 2014(1): 58-69.]
- [19] Qi Jianan. 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migrants' wish of leaving the city: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based on a survey conducted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Population Journal*, 2014, 36(5): 80-86. [齐嘉楠. 流动人口离城意愿实证研究: 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市调查的初步分析. *人口学刊*, 2014, 36(5): 80-86.]
- [20] Tong Yufen, Wang Yingying. The choice of floating migrants in China: Why megacities are always preferred? A cost-benefit analysis. *Population Research*, 2015, 39(4): 49-56. [童玉芬, 王莹莹. 中国流动人口的选择: 为何北上广如此受青睐? 基于个体成本收益分析. *人口研究*, 2015, 39(4): 49-56.]
- [21] Li Bin, Li Tuo, Zhu Y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urban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ynamic spatial econometrics models by use of panel data from 286 cities of China. *China Soft Science*, 2015(6): 79-90. [李斌, 李拓, 朱业. 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财政支出与城市化: 基于中国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 *中国软科学*, 2015(6): 79-90.]
- [22] Hou Huili. The difference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its influence on population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6, 36(1): 118-125, 128. [侯慧丽. 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差异及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 2016, 36(1): 118-125, 128.]
- [23] Wang Runquan, Liu Yiwei. Can housing fund retai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ce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pulation & Economics*, 2017(1): 22-34. [汪润泉, 刘一伟. 住房公积金能留住进城流动人口吗? 基于户籍差异视角的比较分析. *人口与经济*, 2017(1): 22-34.]

- [24] Wang Xiaofeng, Wen Xin. The influence of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on willingness of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integration survey of 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Population Journal*, 2017, 39(1): 38-49. [王晓峰, 温馨. 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8城市融合数据的分析. *人口学刊*, 2017, 39(1): 38-49.]
- [25] Liu Tao, Qi Yuanjing, Cao Guangzhong.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Uneven landscap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s on urban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4): 567-581. [刘涛, 齐元静, 曹广忠.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 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 *地理学报*, 2015, 70(4): 567-581.]
- [26] Sheng Yinan. Influence of residing preference of migrants and policy evaluation.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6, 40(9): 67-74. [盛亦男.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及政策评价. *城市规划*, 2016, 40(9): 67-74.]
- [27] Wang Jianhua. Urban scale, public service and the tendency of family cohabitation among migrant workers. *Youth Studies*, 2017(3): 31-41, 95. [汪建华. 城市规模、公共服务与农民工的家庭同住趋势. *青年研究*, 2017(3): 31-41, 95.]
- [28] Yang Xiaojun. The impact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quality on population mobility.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7, 37(2): 104-114. [杨晓军. 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 2017, 37(2): 104-114.]
- [29] Hou Huili. The effect of the urban scale on the migrants' fertility intention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2017, 23(5): 42-48. [侯慧丽. 城市化进程中流入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 *人口与发展*, 2017, 23(5): 42-48.]
- [30] Hu Rong. Housing inequality during market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the data of CGSS2006. *Society*, 2012, 32(1): 126-151. [胡蓉. 市场化转型下的住房不平等: 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 *社会*, 2012, 32(1): 126-151.]
- [31] Xu Huang, Martin Dijst, Jan van Weese, et al. Residential choice among rural-urban migrants after Hukou Reform: Evidence from Suzhou, Chin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7, 23(4): 2035-2052.
- [32] Yang Xi. City size and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roductivity and amenity differences among Chinese cities.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7, 16(4): 1601-1620. [杨曦. 城市规模与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 基于城市生产率与宜居度差异的定量分析. *经济学(季刊)*, 2017, 16(4): 1601-1620.]
- [33] Liu Naiquan, Yu Chuang, Zhao Haitao. Migrants' access to urban public serves and dwelling will in cit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Region Economic Studies*, 2017(6): 112-126. [刘乃全, 宇畅, 赵海涛. 流动人口城市公共服务获取与居留意愿: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 *区域经济研究*, 2017(6): 112-126.]
- [34] Cai Xiuyun, Li Xue, Tang Yanhao. China's public service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2, 32(6): 58-65, 112. [蔡秀云, 李雪, 汤寅昊. 公共服务与人口城市化发展关系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32(6): 58-65, 112.]
- [35] Han Fuguo. Influential differences of human capital and urban integration on migrants' access to the urban common public resources: A research based on Guangzhou Survey in 2012.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16(6): 44-55, 88, 156-157. [韩福国. 人力资本和城市融入对公共资源使用的影响差异分析: 基于2012年对广州市流动人口的调查. *浙江社会科学*, 2016(6): 44-55, 88, 156-157.]
- [36] Zhang Zhanxin. The marketization of employment, the social security tolerance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ights//Zheng Zhenzhen, He Zhenyi, Zhang Zhanxin. *Comparative Study on Mi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6: 36-64. [张展新. 就业市场化、社会保障包容与农民工权利均等化//郑真真, 贺珍怡, 张展新. *中美流动迁移比较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6-64.]
- [37] Song Yueping, Li Long.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health archiv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15(3): 84-88. [宋月萍, 李龙. 流动人口健康档案现状调查分析. *档案学通讯*, 2015(3): 84-88.]
- [38] Guo Jing, Wen Haoyi, Zhou Qingyu. Status and determinants on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2014, 7(8): 51-56. [郭静, 翁昊艺, 周庆誉. 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4, 7(8): 51-56.]
- [39] Wang Jichuan, Guo Zhiga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1. [王济川, 郭志刚. *Logistic回归模型方法与应用*.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40] Gu Shengzu, Li Rui, Cao Yubo. The dual-path selection for Chinese rural migrants' becoming citize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hukou reform.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4, 34(5): 2-10, 126. [辜胜阻, 李睿, 曹誉波.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二维路径选择: 以户籍改革为视角. *中国人口科学*, 2014, 34(5): 2-10, 126.]
- [41] Jaccard J, Turrissi R. *Interaction Effects in Multiple Regressi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3.

The impact of migrants' access to urban public services on their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sized cities

LIN Liyue^{1,2}, ZHU Yu^{1,2,3}, KE Wenqian^{1,2}, WANG Jianshun^{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2. Key Laboratory for Humid Subtropical Eco-geographical Process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3. Asian Demographic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rbanization has been attached an increasing importance in China's overal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citie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ffecting the urbanization trend in China. In such a context, both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have increasingly attempted to understand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 However, few studies so far have examined the role of migrants' access to urban public services in affecting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sized citie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6 national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migrant population" in Shanghai Municipality and Shandong, Jiangsu, Zhejiang,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this paper aims to address this issue. We utilize a composite index consisting of three dimensions to measure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namely the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the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and the urban housing purchase intention. We divide urban public services into two types, namely employment-related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non-employment) public services.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upply of the two type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and their impacts on migrant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different-sized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gger the size of a city is,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that migrants get access to urban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higher their level of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is. Migrants with easier access to the urban public services are more likely to settle down in cities. Through th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we also fin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features, and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two type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provided by cities for migrants have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affecting migrant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However, the impacts of access to urban public services on migrant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are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sized cities.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facts. First, migrants with easier access to unemployment insurance, medical insurance and housing security are more likely to settle down in cities, but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limited to large cities. Second, in all size cities, migrants who are more likely to be covered by resident health records and receive more health educ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settle down in cities. Finally, in small cities, only those covered by resident health records and receiving more health education have great effects on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Keywords: urban public service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different-sized cities; migrants